



1980年，Betty Barr重返上海，Betty身后的楼房二楼即为当年她和父母、哥哥蜗居的斗室。

日本集中营：上海西侨的

黑色记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宣布来自英、美、荷兰、比利时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救国侨民”。

1943年1月24日到1945年8月，包括英、美、荷兰等国在内的6200名在沪外籍侨民，以救国侨民身份强行收入集中营。当时上海共有九处日军关押西侨的集中营。

本文主人公Betty Barr，是一位与上海有着特殊感情的英国人，她父亲是苏格兰人，由伦敦教会派往中国，在麦伦中学任英语教师，母亲是美国人，1930年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任职，并在上海沪江大学教英文。

1933年，Betty Barr在上海英国乡村医院（今华东医院）出生，在上海西童女校（今市西中学隔壁原第一师范）上学，

文 / Betty Barr 程乃珊

二战期间，她结束了西方侨民在上海拥有的优裕生活，与父母一起被关押在龙华集中营，直到二战胜利才重获自由。

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一切快乐

1941年12月8日，Betty照常去上学，她家所在的愚园路离外滩约六到七华里，一路上并未见到日本军队。但当她抵达学校时，同学们都在议论：“打仗了，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龙华集中营内的单身宿舍

Betty的母亲Ruth不愧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专业人士，她当时已经预料到，珍珠港事件必将改变世界并载入史册。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故而从1941年12月8日起，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日记没中断过。

接下来发生的是：日军占领了英国会所和美国会所、Moore（沐恩堂），美领馆撤离，LMS教会也被日军告知要撤离。Betty的父亲John被困在虹口学校内没法回家。母亲Ruth整个下午忙着打电话，安抚孩子们，担心上海会遭轰炸。晚上收听德国电台的新闻。日方通告所有外侨必须在五日内带着护照向日军当局登记。

中国朋友们纷纷以食品和钞票帮助这些瞬间从天堂降到地狱的外国朋友们。

Betty的母亲Ruth的日记接下来写道：

1941年12月10日，星期三

Betty学校只保持半天上课。

搭1路电车去市中心，在进入公共租界时要

向日军出示护照。

回沪江大学上课，全班二十二个学生中只有十个学生仍坚持上课。满街是恐慌的人群，到处是日军贴出来的告示。在福州路的哈密尔顿大楼前，英美侨民排着长长的队列等候向日军登记。

没有人知道战争将何时结束，有讲3个月，有讲12个月，但我想要3年！

那段时日真是艰难。食品短缺（因为海陆交通给封锁了），面包首先从店铺中消失，米店门口排起长长队列。幸好Ruth记起在LMS教会还储有一点食品原先准备运去汉口教会，现在汉口也在日军占领下，这些食品运不出去，即使运出去，也是羊落虎口。他们因此分得一些麦片奶酪（钱可以以后估算），但无济于事。

因为缺少燃料，有些外国人甚至把忆庭盘路（今江苏路）上的树枝树桠都拾回去供取暖做饭用。接下来马路上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也相继消失了。马路上交通工具只有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

在紧贴日本海军部的哈密尔顿大楼外，



这些裸露着上身做着体力活的外国人，当年可是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Betty的母亲Ruth与大批英美侨民一起列着长队等候登记。Ruth注意到那天共有9000个外侨办理了登记。1156个是美国人（约有700个男性，400个妇女）。每登记好一个，日军要他们戴上印有B（British）的标记，并被告知，不准除下。这是一个作为敌战国的标志！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缺钱（银行被日军控制，

限额每次只准取 500 元中国币), 少食物, 一些学校迁往内地, 一些学校关闭了。

Betty 无忧无虑的童年, 从此结束。一场更惨重的灾难在等着他们全家——进集中营!

在龙华集中营的日子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美日宣战之后不久, Betty 已经听到双亲忧心忡忡的谈论, 英美侨民已经开始被提到提篮桥监狱问话。更有人已被送到专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Betty 的父母日夜为家庭命运前程担忧, 日本当局已通知他们作“入营准备”。日本人规定, 每个人营家庭只允许带四件行李, 但并未规定行李的尺码大小。他们叫来几个中国打包工, 做了一个足以放入全家四张床、被褥的大行李。杯盘、扫把、洗衣板、常用药品、冬衣, 甚至 Betty 母亲的皮草大衣都打入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们预料到, 将在集中营里熬过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日子!

4 月 10 日, Betty 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 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 四个号码伴随了她的全家 800 多天, Betty 的号码为 22/228。

顾名思义, 龙华集中营就在龙华, 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 可以遥望到那著名的龙华塔。

作为营内第十组的成员, Betty 目睹双亲填了这样一张表格——大意为入营者必需遵守营内一切规章制度, 不做有害于日本国的任何支敌助敌活动, 不违抗营内任何指令, 服从营内当局人员管束等等。

Betty 一家被分配到只有 12×14 英尺大小的房间, 比 Betty 在愚园路家她自己独立的房间还小。不过, 他们还是值得庆幸的, 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后来才知道, 许多家庭共同居住在一间房间里, 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 他们像沙丁鱼一样, 五十来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最大的困难是, 那小小的十六平方的房间, 容不下他们的行李。光那四张床铺就已将房间塞满了, 其他东西只好堆塞在门外过道上。大家都将东西堆垛在过道两侧, 以致过道只留出窄窄一条通道。整个二楼住着 24 户人家, 共用一个厕

所和盥洗间。

整个龙华集中营内共有十幢房子, 围绕这些建筑的一些小别墅式房子, 就是日本官兵们住的。然后, 是一个有十八个床位的医院和一个小农场, 养着两头奶牛几头猪和一些家禽。整个集中营有两个公共食堂。

养尊处优的西方侨民一向是舒服地坐在餐桌边, 等候上海佣人将菜一道道送上来。现在, 他们只好端着洋铁碗, 排着长龙, 等待伙食配给员吝啬、精确的“施舍”。

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只硬面包, 一杯绿茶; 午餐晚餐是米饭和麦糊。

西方人非常讲究秩序和科学管理的传统, 即使在集中营里, 也是顽强地表现出来。大家推选出一位集中营代表, 以统筹关心难友生活事宜。每一幢楼, 有一个楼长。每一大间由几个家庭合住的房间, 都选出一个室长。

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Betty 的父亲, 一个从前连一只鸡蛋都不会煮的洋老师, 开始做起苦力的工作。过不多久, 他被“提拔”为管理人员。他的工作是确保在厨房工作的难友没有一个人可以将食物偷出去。而对女人来讲, 偷偷将蔬菜山芋藏在围裙里偷出去是太容易了。而这些前洋行大班夫人、大企业老总夫人, 在饥饿与绝望的重压下, 往往会做出连她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事。

食物之外, 得到干净的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集中营远在乡下, 虽有自己的水泵间, 但因缺煤几乎从不运作。水泵不工作, 龙头里就放不出水, 只好用井水, 用水是受到限制的。

首先, 洗澡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至于热水供应, 更是天方夜谭。隆冬腊月都无热水供应。

在 Betty 住的 G 号楼, 110 个女难友只有四个厕所。特别是在早上和晚上, 上厕所就会排成长龙。食用水是配给的。一天每人只有五品脱。如果互相串门, 需自带饮用水。

不过, 连 Betty 都承认, 今天看来, 他们在集中营受到的种种“苦难”, 与上海当时的劳苦大众相比, 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在父母们的关注下, 即使在集中营内, 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 仍是学习。

基于集中营内关押着太多的在上海各教会名

校任教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教学有丰富的经验，在入营前已是桃李满天下了，所以，一所具备一流师资人才的高质量的、可以讲是当时最优秀的学校，在集中营内成立，取名为龙华公学。

Betty 的父母本来就是教师。所以他们义不容辞地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做了龙华公学的义务教师。龙华公学还有运动会。Betty 因为个头矮，还是左撇子加近视眼，很遗憾不能参加运动。当哥哥 Dick 与同伴们比赛足球时，她就起劲地做拉拉队员。集中营内的学校，并不因为是非常时期而显得松垮和马虎。整个龙华公学执行的是英式教学体制。所以，一样也有暑假。

营内的成人们当然没有他们这样轻松，而且他们都被命令做很重的活。Betty 犹记得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 Anglican 神父和他的朋友们主动要求做最恶劣的工作——清洁下水道。此外，还有烧砖的苦役，那些年纪不轻的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砖窑边干活。要知道，这些人以前可是跨国公司的大班。

对 Betty 的双亲来讲，生活是单调沉闷和与世隔绝的。惟一一次与外界接触，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在 1943 年 11 月 3 日，即 Betty 全家入营半年后，被允许发一封只能有 25 个字的电报，给他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外祖父母。

就这样，光阴在无望中消耗着。极少数幸运的人给放出去。但包括 Betty 在内的 1750 名难友一直被关押其内。

出于信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Betty 的父



美国记者为四岁的 Betty Barr 和七岁的哥哥 Dick 拍的照片，并登载在《达拉斯早报》上。

母尽力在集中营内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常邀请朋友们到他们房内打桥牌。Betty 还记得，来得最多的两个：一个是英国银行家，一个是比利时银行家。Betty 十分盼望他们来打桥牌，因为每逢此时，母亲总会在简陋的自制炊具上，烘焙一些布丁水果面包。

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集中营里有时会举行音乐会，都是唱片音乐会。在 F 楼 E 楼屋顶上举行。音乐会的唱片是难友们被关押时带进来的。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

这些西方侨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人，无论在任何逆境困境，只要还有尊严的意识，就不会被击垮。

集中营生活后期

从上面的文字看来，龙华集中营的生活并不怎么恐怖可怕。其实，那只是一个还不甚谙世事的女孩的回忆！成熟了的 Betty，越来越感受及亲眼目睹集中营内的恐怖及残酷。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日本兵来查房时，每人都必须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有谁在点名时不在位子上，其他同楼的难友都会受到株连。有时，这种查房也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有一次，住在 Betty 邻室的一位老人动作慢了一点，被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日本兵还常会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铁丝网的工具。每当他们入室搜查，Betty 的心总会阵阵狂跳。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小床内。

1944 年 8 月 19 日，有三个难友出逃了。日本人狂怒了。首先，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一天只供应两餐。图书馆关闭，所有唱片及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不许私自用小灶具做饭。没收一切工具。

那天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日下午，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在追打一个难友，把他五花大绑，用扁担狂打他。这时，D 楼的难友潮水般从楼里涌出去搭救那位难友，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发，场面失控。这样，就造成 F 楼几个人趁势逃脱的机会。最后，日本当局从市区调来大批宪兵，总算

控制住了局面。

1944年11月，难友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听到美国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并开始轰炸龙华机场。飞机离他们如此之近，有些难友甚至看见机舱内的美国飞行员在向他们挥手！

日美空战十分激烈。难友们亲眼看到美国飞机冒着黑烟被击落在田野里。当时日伪办的英文报纸曾悬赏一百万伪币活捉一个美国飞行员。营内悄悄传播着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有些人消息特别灵通。战后才知，原来他们有一架收音机，被秘密藏在田里一个砖窑里。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1945年开始，人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并且开始染上可怕的疟疾。虽然集中营内有全上海最优秀的医生，但无济于事——因为药品短缺！

到了1945年早春，集中营里的伙食标准已降到最低。根据Betty母亲当年的日记，早餐一周有四天只有一杯茶，有三天是一盎司的麦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山芋。晚餐根本就没有。衣着也成了大问题。孩子们都在长身子。难友们只好把孩子们的衣服收拢起来，互相轮着穿。

在集中营期间，通过美国红十字会，Betty一家总共收到两次装满食品的包裹。Betty记得她母亲在日记上如此写道：“这是我进集中营多日来第一次，带满足的心情上床——再也不是忧心忡忡和绝望。”

天亮了！熬出头了

1945年4月的一天，难友们突然发现，美国飞机在碧空蓝天不时排成V形队列低空掠过。美国飞机在向集中营的同胞们传递盟军在欧洲战场获胜的捷报！

难友们兴奋无比。不久，又辗转传来盟军在菲律宾告捷的消息。同时，各式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会被逼转移至内地。也有的说，在盟军登陆前他们会被全部就地枪毙。

到了8月，日本投降的讯息已传遍全营。1945年8月15日，Betty母亲的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中午时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这最终

证实战争结束了。天亮了！熬出头了。下午七点，全体难友们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在我家所在的F楼屋顶上，六面国旗迎风招展：美国、丹麦、英国、中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都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样蓝！月亮是那样明亮——一切是那么好！那么好！

第二天，大家走出平时戒备森严、不可越雷池半步的集中营大门。为了享受久未享受到的一种心情，Betty全家在一个高高的可以望得见黄浦江的小坡上野餐。

接下来的几天，成百成百的人从上海赶来这里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们。大家相拥而泣。营内处处可见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

8月17日，日本军队悄悄地撤离了集中营。

胜利后的收尾工作进展得顺利而有序，难友们被劝告暂时仍留在营内。因为此时上海市区反而不及营内安全。

当时有两件事让Betty印象最深刻。一是盟军入营进行解放仪式时，Betty的母亲、营内为数不多的美籍女难友之一，被推选作为欢迎入营美军的代表。二是1945年9月7日，美国飞机向营内投下大量的装有食品的包裹。为了给难友们一点惊喜，这次空投完全是突然“袭击”。

到了9月末，Betty一家被告知，一艘美国的和一艘英国的伤兵运输船可以运载少量的侨民回美国和英国。

Betty的父亲虽然思乡心切，但还是决定在上海逗留半年以帮助麦伦中学的复校事宜。而Betty的哥哥Dick已到了入寄宿学校的年龄，所以他登上了赴英国的船，就读他父亲曾读过的那所寄宿学校。而Betty则由母亲带着回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一抵达外婆家门，在餐厅里，Betty的母亲就轻声在她耳边说：“你看见酒吧台上有什么？”“看见了！”Betty同样轻声回答。

原来，那里搁着一样她们已有好多年没见到的水果——香蕉！

基于Betty Barr一家那份难舍的上海情愫，与美国亲人短暂团聚一段时日，全家又回到上海。父亲继续在麦伦中学任教，母亲也回到沪江大学和青年会，直到1950年……这将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责任编辑/亚闻)